

港珠澳大橋開通成香港新動脈

港珠澳大橋興建和開通的最大意義，在於打通粵港澳大灣區的交通網絡，推動大灣區的經濟建設和物流發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全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創新和競爭能力，為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大橋打開了香港以公路連接大灣區的又一條新通路，對發展香港經濟、方便市民出行提供了新的通道，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再次騰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蘇長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港珠澳大橋全長55公里，集橋、島、隧於一體，包括一條長約6.7公里的海底隧道及4個人工島，為目前世界上最長的沉管隧道及世界跨海距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單從基建規模與工程技術而言，大橋由橋樑、隧道、人工島三者結合而成，是目前全世界同類型公路橋中最長的一條，建設難度極高，加上珠江水文複雜，工程技術人員採用了大型化、標準化、工廠化、裝配化四大先進理念來推進大橋的建設，其間一系列新材料、新標準、新技術、新裝備應運而生，大大充實和提高了我國橋樑建設的工藝標準和施工能力，不少領域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大橋的建成和開通已引起國際矚目。

港珠澳大橋是創新開放快速路

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必將進一步促進港澳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形成一個體現「一國兩制」優勢的經濟合作區。大橋將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高度融合，大大提高經濟效率和經濟規模，有利於建立一個龐大的一體化市場和由創新科技主導的產業體系，使大灣區成為中國新時代改革開放的示範區。近年

來，珠三角特別是深圳、廣州高科技產業突飛猛進，已形成擁有1億人口的廣大市場，人均收入高速增长。而對比之下香港市場則規模有限，創新產業發展較慢，對創新人才的吸引力仍需加強。隨着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相繼開通，兩地的創新人才可以更方便在大灣區創業、工作，港珠澳大橋就像一條創新開放的快速道路，大大提高三地的合作成效。

港珠澳大橋開通的另一層重大意義，在於通過港珠澳大橋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發展，繼而輻射全國14億人口的大市場。在構建高效的交通基建，在路通財通的效應下，可以加速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切實形成以珠江至西江經濟帶為腹地，帶動中南、西南發展，輻射東南亞、南亞的經濟大格局。港珠澳大橋為大灣區提供了重要的基建保障，創造難以估量的經濟社會價值，令粵港澳大灣區成為足以媲美東京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的世界著名灣區，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重大戰略增長極。隨着5G互聯網和數碼化的新產品推出，香港加速融入中國市場，將產生巨大的社會財富，未來最具潛力的創科市場就在中國。

從現實角度來看，港珠澳大橋的通車肯定會為香港物流業帶來新態勢。對物流業來說，多了一條大橋，

就多了一種交通運輸模式，使香港的對外交通更加靈活、便利。港珠澳大橋加強了香港和內地，尤其是珠江西岸地區，以及澳門三地的陸路運輸便利化。港珠澳大橋、高鐵及即將開通的蓮塘/香園圍口岸，預料在2024年啟用的機場第三跑道這四大基建，將會打通香港與四方八面的連繫，如大橋可貫通粵西地區，高鐵則連接桂林、昆明、福建等地，而未來汽車旅遊將愈來愈多元化，亦令香港在面對互聯網新形勢下，有新的發展空間。

大灣區成新時代改革開放示範區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廣東珠三角地區與香港、澳門形成了各具優勢的發展格局，具有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良好基礎。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將極大促進珠江東西岸的互聯互通，形成香港的法律、金融、貿易、國際化運作與澳門的休閒旅遊、珠三角的創新和高端製造業聯動的局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更加均衡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下一步改革開放的重頭戲，將建成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示範區，將打造「一小時優質生活圈」，未來的大灣區往來更加便利，將使香港居民的生活空間得到拓展，幸福指數全面提升。

中導條約遭撕毀風險增 宜加強睦鄰防截圍堵

許楨 博士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日前，特朗普揚言退出「美俄中導條約」。其後，白宮安全顧問博爾頓直抵莫斯科，據信，該位美國極端右派訪俄，轉述美國總統相關意向亦屬其主要任務之一。一時間，不只普京有所反應，連捷克、德、法等歐盟核心國家，以及北約高層，也嘗試勸說華府收回成命。

然則，以特朗普上台後的作派，以及蒂勒森、黑莉等具政經分量的官員一一求去、或被迫引退，白宮之內取態極端、唯總統之命是從之輩竄起。如同遷移駐以色列大使館到東耶路撒冷一樣，過去數十年來，必須慎之又慎處理的敏感安全問題，眼前的特朗普對外工作團隊，都顯得尤其興之所至、隨心所欲。在此過程中，北京的外交立場和安全利益，也備受關注。

美破壞了大國間互信與核武平衡

考慮到中國的地緣環境，以及國際政經形勢變化，若在相關問題上自以為事不關己，則恐生禍患。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如何應對，成為眼前實質而難解的挑戰。而當中的關鍵，還在於克里姆林宮，包括普京本人，在處理相關問題時，未必會像處理克里米亞危機、敘利亞內戰般，傾舉國之力以迎美軍、北約。相反，莫斯科會否順水推舟，一方面抗議特朗普破壞世界安寧、取得道德高地；另一方面，又趁勢調整自身的國防發展路向與佈局，實在是中國戰略安全的一大變數。

「中導條約」是1987年冷戰之末，戈爾巴喬夫與列根在華府簽訂的限武條約，不只具有軍事意義，在政治上也確立了美、蘇的互信與合作。冷戰從1970、1980年代之交的激烈對抗，到1980年代中以後從緩和走向結束，無疑，「中導條約」的簽訂是最具代表性的外交成果之一。

然而，30年過去，世界格局、軍事科技變化已甚；小布什在其上任之初，竟然退出同樣重要的「反導條約」，讓美國海、陸、空三軍，逐步建構以「愛國者—薩德—標準導彈」為骨幹的環球防空及導彈防禦系統。經過近20年的投資、試驗與部署，及至最近已然成形。在日、韓、捷克、波蘭等地，構築針對中、俄的預警及攔截體系，破壞了大國之間的戰略互信與核武平衡，未來，假如北京與莫斯科無法急起直追，所謂受襲後核反擊、核報復能力形同虛設，變相增加了核大戰的可能。

中國與周邊國家戰略互信更重要

為反制美國在北約及其他戰略夥伴國建立的反導系統，俄軍推動各式各樣的針對性軍備研製。面對不斷被納入北約的歐洲國家，機動發射的陸基中程彈道導彈，成本效益最高之餘，蘇聯留下的技術儲備也最豐厚。甚至，可以發展成出口印度、東南亞、中東的型號。因此，特朗普、普京先後發話後，先被激起的並非美、俄民情、輿情，而是歐陸諸國大呼不妙。

中國本身不受該條約管轄，有權發展自用型中程彈道導彈。用作外貿的彈道導彈，在一般情況下，則射程受限在300公里以內。因此，在過去半世紀以來，尤其是踏入2000年以後，解放軍裝備的彈道導彈，據悉，達洲際、遠程的規模有限，反以中、短程為主，以遏制佈防在東北亞、東南亞近鄰，以及太平洋中、西部島嶼上的強大海、空軍力。

可見，一旦美、俄相繼退出「中導條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政經關係與戰略互信，變得更加重要。要確保東北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與華接壤的數十國，不至於倒向美、俄新建的中導體系，實在有賴軍事及外交部門的即時應對與長遠工作。至於技術上，如何提升自身的中程導彈性能，又加強海、陸要地的反導能力，反而不是最緊急、最根本的挑戰。

「明日大嶼」是香港「再發展」機遇

姚祖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特首於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明日大嶼願景」，建議在交椅洲及喜靈洲附近填海建造多個人工島，面積達1,700公頃，可以興建26萬至40萬個住宅單位，容納70萬至110萬人居住，2032年就可有市民遷入。

交椅洲與喜靈洲，可能大家有點陌生。從地圖上往東看，交椅洲附近填海處，距離中環只有10公里，有些新界地區距離市區可能是好幾十公里。再從地圖上往西看，交椅洲與喜靈洲的未來人工島位置鄰近香港國際機場及港珠澳大橋，那也就是連接了世界各地，也更是連接了澳門、珠海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形成「一小時商業圈」。可見這一地理位置極佳，可帶來的經濟效益也將極大。

在我看來，這一計劃將給香港帶來「再發展」的一系列機遇，有了這塊土地，我們可以興建房屋、發展商業，也能大大投資香港基礎設施業，成為香港最大規模的新市鎮，以及繼中環和東九龍之後第

三個核心商業區，提供超過30萬個就業職位。為香港的長遠土地需求、住屋、就業及經濟發展帶來保障和注入新動力。

當然這一計劃一出，立馬有了反對聲音，有擔心政府開支、也有擔心生態保育，還有一些一聽到填海就盲目反對的。其實香港的百年發展歷史，也是一個離不開填海的發展故事。百年來，香港因填海得來的土地已逾7,027公頃，幾乎等同一個香港島面積，200萬人口因而受益、得以安居。放眼世界各地，亞洲新加坡、歐洲荷蘭和丹麥都以填海、填湖來獲得更多土地，從而帶來地區的「再發展」機會。

在香港的未來議題上，社會需要更多的理性聲音來廣泛討論填海規劃，使計劃盡早落實、開始實施，切勿因「政治」、「黨派之爭」而影響全港人的福祉。我相信經過廣泛討論，廣大市民會理解這一計劃將給香港帶來一個巨大的發展機遇，讓更多市民有住屋、讓更多市民有工開、讓香港青年有更多機會來大展身手。

乘灣區東風破香港創科困局

陳曉鋒 法學博士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在中國互聯網和科創發展的上半場，香港在某種程度上是缺席的，既沒有從中國互聯網從PC端到移動端的人口紅利中獲得較好的發展，也沒有從頂層設計上對互聯網及科創發展提供相應的如資本、技術、人才服務等全方位的配套措施。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在中國互聯網發展即將開始的下半場，香港應該乘著粵港澳大灣區的東風，把創新科技打造成為香港的一張新名片。

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擲地有聲地強調，「我們要堅定沿着改革開放之路走下去」，傳遞支持擴大改革開放的重要訊號，為國家發展指路航向、鼓勁打氣，讓民眾對未來充滿信心。習主席還強調，要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大機遇、大文章，抓緊抓實辦好。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課題中的應有之義，這對於擴大和深化香港與內地科技合作、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確保「一國兩制」偉大事業行穩致遠具有重要意義。香港創科發展既要着眼長遠，又善用傳統優勢加快創科發展步伐，在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與鞏固提升傳統三大中心地位之間互相促進，為香港發展注入更強動力。

香港錯過了騰訊，錯過了阿里巴巴，中國互聯網和創科發展的上半場落幕了。隨着物聯網、人工智慧、區塊鏈等一一湧現，互聯網和創科發展的下半場已經到來！人工智能已經在悄悄地接管我們這個生活的操作系統了，比如影響了我們在買什麼、我們應該如何想，我們去哪兒玩，跟誰結婚等。

在搶佔下一波互聯網和創科發展浪潮的制高點的過程中，香港除了要為創科發展提供良好氛圍外，還要從頂層設計上更加注重新文科人才的培養和引進。科技的前景光芒萬丈，但需與人文領域並駕齊驅，才能馳騁於快速變遷的世界。我想，這就是為什麼 google 總部曾聘請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教授 Damon Horowitz 擔任公司內部的哲學家，而 Nokia 的廣告詞定為「Human Technology」的原因吧。

填海拓地增儲備 早為後代謀福祉

方潤華

特首林鄭月娥發表上任後第二份施政報告為解決香港長遠土地和住屋問題，提出「明日大嶼願景」規劃，擬在生態環境敏感度相對較低的交椅洲及喜靈洲附近分階段進行填海，建造總面積達1,700公頃的人工島，料可興建26萬至40萬個住宅單位，供70萬至110萬人居住，創造34萬個就業職位，其中公屋和私樓比例為7:3，冀能縮短屋輪候時間，助市民圓安居夢。

香港地少人多、樓價租金高企，難有一個「安樂窩」已是不爭的事實，高房價也導致經營成本增加，令商家、外企和投資者卻步，影響香港整體經濟發展，乃至創科中心的設立。早年 Google 有意在港設置雲端數據中心，卻因本港欠缺合適土地而最終選擇落戶新加坡。上月 facebook 比較綜合因素後，亦決定於新加坡投資建設數據中心，兩家世界著名企業捨港而去，可惜之餘也敲響警鐘。有道是：不進則退，本港近些年因政治爭拗令一些關乎經濟、民生的基建項目不能上馬拖慢發展進度，要知道很多基建都有時效性及機會成本，若不抓緊機遇，恰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蘇州過後無艇搭」，不僅減弱了競爭力被對手超越，也影響未來持續發

展。日前世界經濟論壇發表2018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排名第二，本港跌一位居第七，應引起警惕。

人們常說「安居樂業」，可見居住問題乃民生首要，若市民、年青人的房屋問題解決不好，社會難言安穩與和諧。「明日大嶼」可一次過為香港帶來過千公頃的土地儲備，解決安居與發展的需要，顯示了政府迎难而上、解決困局的魄力和勇氣，不僅可紓緩市民居住難問題，亦為本港經濟發展帶來龐大動力。至於有人擔心「明日大嶼」投資巨大，政府庫房是否有能力負擔，其實這個擔心是多餘的，估價5,000億的建造費成本是多年分攤，造了新地後政府可賣地回籠資金，新增職位亦會為庫房帶來稅收，因此具可行性及前瞻性。

隨着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大嶼山發展得地利之便，位處大橋香港口岸，是進入內地及聯接香港國際機場的「雙門戶」，於「大灣區」內的交通、貿易與人流發揮重要作用，必將更有可為。「明日大嶼願景」可說是適逢天時、地利，前途光明，為香港開創了美好未來！

中日關係否定之否定再思考

劉斯路

名家時評

否定之否定，是唯物辯證法三個基本規律之一。這一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呈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進的形態，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其描述了事物發展從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三個階段。而否定之否定後的狀態，並不是原有肯定的狀態的完全重複，而是如螺旋般上升了或似波浪般前進了。回顧十多年中日關係軌跡，是很鮮明的友好、不佳，再回暖升溫的否定之否定過程。這次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是這一波雙邊關係轉角，恢復正常友好務實合作軌道的一個標誌。筆者期望，一衣帶水的中日近鄰、經濟規模位列世界二、三的兩個大國，將更為互利共贏的內在能量驅動，在一個「新的務實合作時期」行穩致遠，走得更快更廣闊。

筆者長期觀察中日關係，2005年4月9日筆者在香港文匯報撰寫文章《中日關係的理性思維》，既指出日本右翼逆流的錯誤，也針對內地不健康的情緒，提出：中國和亞洲人民在處理對日問題上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維。目前，要反的不是日本企業，不是日本人民，也不是日本文化、日本的產品、日本的技術、日本的資金，要反的是日本右翼勢力及其政策。如果將反對日本右翼簡化為「反日」，正好為日本右翼所用。該文被中央和地方媒體廣泛轉載。十幾年過去了，中日關係中的風風雨雨證明，日本的反華逆流並不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而用理性思維管控兩國的分歧矛盾，積極擴大共同利益是正途。

安倍晉三這次訪華是時隔7年後日本首相首次正式訪華，2012年當時的日本政府無理將釣魚島所謂「國有化」，將中日關係推到了個很危險的最低谷。也可以說，這之後兩國關係經過艱難調整，終於迎來轉角。筆者相當看重中日達成共識中三項既有強烈的實效性又對雙邊關係影響深遠的成果：第一，中國同意日本的要求，盡早重開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協議。第二，中日重啟被擱置五年的貨幣互換，規模比此前擴大十倍。第三，中日積極擴展第三方市場合作。

筆者將東海問題放在首位，因為這事關中日之間的基本矛盾，是中日關係的主要矛盾。固然，長期讓中日關

係起起伏伏的釣魚島主權爭議和歷史問題，在安倍這次訪問中沒有公開提及，但是，中日既然能夠重啟東海石油共同開發談判，並且簽署《海上搜尋救助合作協定》，顯示日方既默認東海及釣魚島的新現狀，也被迫回到「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的軌道。無疑，這一否定之否定與40年前鄧小平先生提出時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上升到更高的階段，中方由鞭長莫及到實際控制。這種變化，是因為中國的綜合實力的增長並在多方面超越日本，日方需要接受現實，而這正是未來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基礎。

中日關係的這次轉角，「特朗普因素」也相當重要。中日美三角關係，是當今世界重要的三角關係。美日有軍事同盟，日本是美國圍堵中國的所謂島鏈的重要一環，日本右翼也以美制華。但是，美日之間也有基本矛盾，美軍駐日就是「尖銳之角」。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常常埋怨中國，其實只要美軍駐日一天日本就一天不是正常國家。而特朗普的這一波反貿易自由化，更激發日本對「中國因素」的渴望。中日時隔五年再簽貨幣互換協定，既是對美元說不，更是表明中日在堅持經濟全球化的共同利益。



■安倍訪華標誌中日關係回暖，圖為兩國年輕人在東京街頭開展「中日友好抱一抱」活動。